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

# 先唐文學與文學思想考論

增补本

徐正英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

# 先唐文學與文學思想考論

增補本

徐正英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增补本) / 徐正英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12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7846-7

I . ①先… II . ①徐… III .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7033 号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  
**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增补本)**

徐正英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3.25 插页 2 字数 494,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846-7

I · 2981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王运熙序

徐正英同志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论文集将于近期内公开出版,为之十分高兴。

正英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执教于河南省安阳师专(今安阳师院),着重教元明清文学。20世纪80年代进入复旦中文系硕士课程班学习,重点移至汉魏六朝唐宋文学与文论方面。当时我在该班任教,与之相识,他学习态度的认真坚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返回河南,不久即转至郑州大学中文系工作,担任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课程。上世纪末,又去西北师范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其方向是先秦文学与文论。去年,博士生毕业后又去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后,继续学习与研究。

正英同志的教学研究方向,由元明清文学上推至汉魏六朝唐宋文学,再上推至先秦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几个阶段,他都涉猎过了,并在某些点上作了深入钻研。这一过程不但使他视野广阔,而且培养了明晰的分析判断能力。收集在本书中的论文,上自甲骨、金文中所表现的文学思想,下逮顾炎武对《文选》的研究,是他近二十年来陆续续写成的研究成果。他的论文写得认真细致,注意发掘搜集有关资料,进行仔细的剖析,不作故意惊人之论,但论断大致客观合理,并往往有自己的使读者获得启发的见解。总之,论文内容使人感到充实、合理并有新意,这应当说是很不容易的。

正英同志为人热情豪爽,忠厚善良,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业务执着追求。他在攻读研究生期间还时常在郑大文学院兼任一些工作,为此时常奔波于两地之间,辛劳而不叫苦。他在科研方面已经取得相当良好的成绩,但谦谦毫不自满,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这都令人感动,佩服。环顾当今国内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年轻学子在选

择研究方向与对象时,往往希冀速成,避难就易,学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人多,学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人少,因为后者古汉语的难度要大得多。与此相反,正英同志搁置原先较熟悉的元明清文学,转攻汉魏六朝以至先秦文学,并由传世文献转向出土文献,其舍易就难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相信他本着这种精神孜孜不倦地继续追求,今后一定会取得更加良好的成绩,并将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王运熙于沪上寓所(时年七十有九)

2004 年 10 月

## 曹道衡序

自从王国维先生提出了把传统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双重论证法”以来，已经八九十年了。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研究者和古文字学研究者努力实践了这种方法，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绩。相对来说，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却显得比较滞后。其实这也有其原因。因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考古发现的史料，大部分是一些实物，即使有文字的实物，也主要是殷商甲骨和两周彝器，至于文学作品则较罕见。但从20世纪的后期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唐革(勒)赋”、“《神乌傅(赋)》”的发现，就给文学史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近几年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的发现，更给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使我们对过去《诗经》研究方面一些结论，都需要重加审视。特别是许多竹简、帛书的出现，证明了历来流传的一些古籍如《六韬》、《文子》、《晏子春秋》等，多为先秦古籍，并非如过去一些人说的那样出于后人伪托。因此对历来一些“辨伪”、“疑古”之说也应该重加审核。显然，据此认为那些相传的古书全部可信未免草率，但一律以“伪书”目之，更非笃论。在这方面，我们也面临着许多繁重的史料鉴别任务。也许，这些工作，还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

在这方面，徐正英博士的《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一书，确实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正英博士长期从事先秦至六朝文学和文论的研究。他对当代的文艺理论有较高的素养，例如《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诸文，都能结合魏晋时代一些士人的种种表现，运用美国学者马斯洛等人的学说，加以解释，使人耳目一新。但更重要的，则在他能扎实实地钻研原始资料，从中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尤其难得的是他除了努力钻研传统的文献资料外,还对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了深入刻苦的研究。例如关于各种文体的起源问题,他就大量地阅读了许多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论证像“表”、“谱”、“诰”等文体实始于殷商。这个论点就是过去很少有人谈到的。过去的学者往往说:各种文体,多起源于“五经”。这种说法除了囿于古人“尊经”的偏见,也自有其原因,那就是他们所见的古籍,最早无过《诗经》、《尚书》,而现在的事实证明殷商的甲骨文显然早于《尚书》和《诗经》(《尚书》中的“虞夏书”和多数“商书”,大部出于后人追记)。因此推论文体起源应该上溯甲骨文、金文,这是完全合理的。在探讨甲骨文、金文的问题时,正英博士还提到了甲骨文中许多有文学意味的文字,这就比过去一些文学史著作更能显示先民的文学成就。如文中所引“甲寅,冥,乞不嘉,惟女”条,从口气看生动地表现了商王重男轻女的失望心理;“……卜,翌日壬王其田? 麾呼: 西有麋兴,王于之擒。”记录商王驰骋捕麋的生动场面。这些文字,显然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英博士在研究这些甲骨文、金文的时候,既大量参考、吸收了当代许多学者的成果,又都能认真鉴别,绝不盲从。例如在《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中,谈到《尚书·汤诰》时,他采取怀疑的态度,因为此篇为伪“古文”而非“今文”,在目前尚无确切证据推翻阎若璩、惠棟的结论时,仍应取慎重态度。又如同一篇文章中讲到“伐”字的解释,他认为罗振玉的说法不能全部否定,这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自古以来,对一个字的解释,就有“本义”和“引申之义”的区别。这一点,许多古人都已经注意到《说文》的解释,有时和毛公、郑玄等“经师”不同。他们认为就是“本义”与“引申之义”的区别。说到“伐”字,据《说文》云:“击也。”从这个字看来,从人持戈,显然是“砍击”的意思。“伐”可以是杀人,也可以是伐木(如《诗经》中的“伐木”、“伐檀”等)。引申为征伐,也可以引申为冲杀,如《礼记·乐记》的“驷伐”,据郑注为“一击一刺为一伐”。这解释我看是有道理的。因为《尚书·牧誓》就有“六伐七伐”之语。这个“六伐”、“七伐”大约就是六次、七次冲击吧。“武舞”中的“一伐”,当即象征这种冲击。关于一些先秦已佚古书的佚文,正英博士也作了仔细的研究,例如所谓的“金人铭”,他认为是春秋时代的作品,这很有见地。《从几则佚文看

先秦诸子的言辞观及其趋同倾向》<sup>①</sup>一文，亦极有见地。因为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一方面既是争论，另一方面也在互相吸收对方的论点，走向融合。这是思想史上必然的趋向。正英博士此论，可谓极当！

除了这些关于先秦的论文以外，有关六朝的一些文章，亦颇见功力。如《20世纪最后二十年江淹研究述评》一文，就显示出作者对《江淹集》本身的研究下了很深功夫，因此论证翔实，深有见地。《顾炎武研究〈昭明文选〉的成就及不足》一文更显示出作者对顾炎武的著作尤其是《日知录》一书的熟习，能够从明末社会风气来看顾炎武论《文选》的言论，所以很是深刻。

当然，正英博士此书，似乎还有些地方尚可推敲。如前面提到“伐”字的解释，除了征引考古材料外，像《牧誓》文字似亦可一提，更可体现“双重论证”之意。

正英博士长期执教于郑州大学文学院，上世纪末，曾来北京跟我进修，由于他工作繁忙，我自愧对他没有多少帮助。后来他到西北师大，师从赵逵夫先生，在赵先生指导下，他的论文取得了飞速的进步，读后令人欣喜。现在正英博士把他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要我作序。我自以为对传统文献虽有一知半解，然而对考古资料所知甚少，本不当充此重任。勉力为之，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曹道衡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时年七十有六)

2004年7月9日

---

<sup>①</sup> 该文原为摘发，这次收入本书时恢复全文原貌，作为《先秦佚文中的文艺思想》的一个章节。

## 增补本弁言

本书是 2005 年 3 月所出旧稿基础上的增补本。原书收录了笔者 1983 年大学毕业至 2003 年晋升教授 20 年间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 18 篇有关先秦至六朝文学与文学思想方面的学术论文，因大学毕业初期教学时段和研习重点都在唐宋明清，刊发的 25 篇学术论文也几乎全是该时段的，自然无法收入以《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命名的书稿之中，所以，旧书稿所收基本上是后 10 年的研习成果。这次增收的 14 篇新论文，则又几乎全是（只有 1 篇例外）2004 年至 2013 年又一个新的 10 年刊发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的新成果，因此，增补本基本上代表了笔者大学毕业 30 年中后 20 年的研习成绩。

借此，就增补本的具体编纂情况说明如下：

其一，新收 2004 年至 2013 年的 13 篇论文，依次为：《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新论》、《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十七简新论》、《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小雅〉中两篇作品》、《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三简新论》、《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五简新论》、《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六简新论》、《〈孝经〉的成书年代、作者及版本考论——以出土文献“郭店简”、“上博简”、“定县汉简”等为参照》、《先秦佚文中的文艺思想》、《“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观照》、《论河洛文化的根源性特征》、《技进乎艺 艺进乎道——从〈论书绝句〉看启功先生的古书鉴定法》。删除了原书中与新收文章内容有重合的《从几则佚文看先秦诸子的言辞观及其趋同倾向》一文，同时在附录中增收了一篇 1999 年刊发的《赵逵夫著〈屈骚探幽〉刍论》旧文。全书共收文 31 篇，总字数比原书翻了一倍多，其中 11 篇曾被转载，标志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代司

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观照》、《〈孝经〉的成书年代、作者及版本考论——以出土文献“郭店简”、“上博简”、“定县汉简”等为参照》三文,虽然分别迟发于2015年和2014年,但是完成于2007年和2010年的旧稿,或本未打算发表而拟直接收入本书,蒙期刊朋友好意才在出书前“突击”修订刊出,或因特殊原因未在2013年之前刊出,但三文均代表笔者与学生2013年之前的研习心得,故应视其为2013年之前的成果。

其二,增补本对所收论文全部作了重新编排。原书按“文论编”、“文学编”、“评论编”的次序编排,但新增最近10年的研习成果多属于“文论编”内容,尤其集中在出土文献及佚文献的文论研究方面,若仍按原书体例编排,则“文论编”与“文学编”的比重就会严重失调,头重脚轻现象突出。故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增补本依研究对象的文献存在形态,按“出土文献编”、“佚文献编”、“传世文献编”、“附录”四部分内容重新编排,从目录上即可窥出笔者的研习趋向和重心所在。

其三,此次重编大致做了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全部书稿逐一进行了重新审校,尤其是对引文,皆依原出处逐字逐句进行核对,发现和纠正了文章原稿或刊发时的不少错误。二是按新的学术规范补充了大量失注的引文新注。三是按出版社的要求统一了各文原期刊千差万别的注释格式。四是调换了一些引文出处的版本,因有些论文发表时,所用引文文本或尚未整理,或为通俗译注本,此次则调换成了新整理出版的权威版本。如此,既保证了引文的准确可靠性,又方便读者查找,自然也出现了注释所用版本出版时间晚于论文发表时间的矛盾现象,祈读者理解。五是有些文章原文过长,刊发时限于期刊字数要求,或精简,或摘发,或分期拆发,此次收入本书时则全部恢复论文发表前的原貌,后两者皆在篇首注中作了说明。另外,个别论文刊发时接受编辑建议改动了题目,此次也恢复了投稿时的原标题,并在首注中作了说明。

其四,有几篇论文是和学生或同事合作完成的。其中与博士生常佩雨、硕士生陈昭颖合作的三文,分别由他们执笔初稿,我做了幅度不同的改写、补充、完善;与其他人合作的六文皆由我执笔完成,合作者辅助。这次收入本书均征得了合作者的同意,并在各篇首注作

了说明。

拙著增补本的出版,需要感谢的人很多。

首先,深切缅怀两位敬爱的恩师王运熙先生和曹道衡先生。两位近 80 岁的老人不仅曾拖着病体为原书作序,而且王先生还为原书设计了“文论编”、“文学编”、“评论编”的编排体例,曹先生则为本书起了书名。王先生在目力降至 0.3 近乎失明早已经“弃读”的情况下,坚持翻完了书稿,借助强阳光才得一笔一画写出序言并附简信寄给了我。曹先生则是细研书稿后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学术短文和最后一封长信,从信中得知,这位从来不会打理生活和手不沾琐事的老人,因师母不在家,又怕误我书出版,竟自己冒雨到邮局亲自将书序和信笺寄了出来,当时拜读信札顿生一种负罪感。令人痛惜的是,敬爱的曹先生并未能见到拙书的出版,因为赐序时他就已患上了直肠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不久便住进医院,并再也没能走出来。如今,两位先生都已仙归道山,每次重读珍藏的两位老人的序文手稿和所附信笺,看着两种近似的隽永字体,两先生的音容就会浮现在眼前,崇敬和怀念之情便油然而生,同时也会暗暗警示自己不敢偷懒懈怠,以不负两位先生的眷顾之恩。这次编纂增补本,也是向两位先生汇报自己近年的一点进步。

还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自本书初版出版后,上古又曾陆续帮助我主政过的郑州大学文学院诸多青年教师出版过近二十部销路不可能太好的学术论著,承担了颇大的经济压力,将不少年轻人推上了副教授、教授甚至博导的位置,这次又为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后所联系的第一批四部阅读群体定然很小的“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慷慨相助,这种为繁荣和扶植学术而不计成本的精神令人感佩。愿借此献上深深的敬意。

同样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学科同仁有一个共同心愿,期待能在这一项目滚动支持下,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长期合作,努力将“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逐渐打造成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学科的一个学术品牌,以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尽绵薄之力。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研究生。为重编书稿,硕士生孙玲玲推迟

毕业离校的时间，自答辩后就整月或全天候地待在我的工作室或穿梭于校图书馆之间，代我这个电脑盲逐篇校对稿件，核查原书，增补注释，不辞辛劳。全书的最后定稿均由其完成，使本书质量大增其色。博士生马芳、硕士生陈婧，此前也为转换论文格式，查找、增补注释出处，付出不少劳动。爱女徐小湾也曾帮助校对或新打印了三篇文章。在此对他们的劳动一并致谢。

徐正英 2015 年 8 月 1 日建军节  
记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三知斋

# 目 录

王运熙序 .....	001
曹道衡序 .....	001
增补本弁言 .....	001

## 出 土 文 献 编

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 .....	003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功能观 .....	040
上博简《诗论》作者复议 .....	056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序复排与简文释读 .....	075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新论 .....	092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十七简新论 .....	102
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小雅》中两篇作品 .....	112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三简新论 .....	119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五简新论 .....	128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六简新论 .....	137
《孝经》的成书时代、作者及版本考论 ——以出土文献“郭店简”、“上博简”、“定县汉简”等为 参照 .....	146

## 佚 文 献 编

先秦文论佚文考辑 .....	209
----------------	-----

先秦佚文中的文艺思想 ..... 228

## 传世文献编

“诗言志”复议	261
先秦至唐代比兴说述论	276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286
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	300
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观照	326
《公莫舞》古辞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353
蔡琰作品研究的世纪回顾	366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新解	378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383
20世纪最后二十年江淹研究述评	393
从《原道》篇看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	404
顾炎武研究《昭明文选》的成就及不足	413

## 附录

论河洛文化的根源性特征	431
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	466
赵逵夫著《屈骚探幽》刍论	476
技进乎艺 艺进乎道	
——从《论书绝句》看启功先生的古书鉴定法	485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502
郑州大学古籍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述评	508
初版后记	519

# 出土文献编



# 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sup>\*</sup>

甲骨刻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档案文献。它主要是商朝后期“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当为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sup>①</sup>时期的产物，其包括商朝宫廷占卜吉凶的占卜刻辞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刻辞和表谱刻辞。甲骨刻辞疑是商朝文献形式中的一种，且又仅局限于宫廷对吉凶的占卜，所以其反映当时现实的能力当是很有限的。由“册”、“典”、“编”等字在甲骨刻辞中的频繁出现可知，广泛记录社会生活和时人思想的文献载体应主要是简牍，只可惜此类文献至今尚未出土和被发现，因此，要对商朝人的文艺思想意识作些窥测，仍只能借助于甲骨刻辞中透露出的点滴信息。

## 一、从甲骨刻辞看商朝人的尚文意识

敬天轻人、尚伐轻文是汉代以来学术界对商朝意识形态特点的基本看法。如，《礼记·表记》托孔子语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sup>②</sup>司马迁更以“野”概括夏，以“鬼”概括商，其《史记·高祖本纪》“赞”语云：“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sup>③</sup>今

\* 本文原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2期，题目为《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7期全文转载。

①（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106页。

② 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版，938页。

③（西汉）司马迁著《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393页。